

陈翰笙在北大, 1924-1927

从1924年4月至北京大学任教, 到1927年4月离去, 陈翰笙在北大整整三年。他在这个期间, 开始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成为共产国际的党员, 并且选定了中国农村研究作为终身事业, 就他本人来讲, 这三年确实是他一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在这期间, 与北大有关, 与他革命工作有关的重要事迹, 略述于下。

①经常来往的人物。多年好友是高仁山。这是一位真心诚意的教育改革家。为他所终身钦佩的李大钊同志。苏联朋友有彼得·格林涅维奇(北京俄文专修馆讲师)、坎托洛维奇(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明欣(北京塔斯社主任)。北大教授是周鲠生。青年学生有王寅生(同乡兼远亲)、陆挹兰(女)。夫人顾淑型在一起生活, 只有1926年有一段时期经李大钊介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② 在德国接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任北大历史教授。

陈翰笙于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从1922年到192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研究欧洲历史。这时候，蔡元培正在欧洲考察。蔡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曾有两次出国考察，均与军阀摧残教育有关，在愤而辞职不主持校务时，两次均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但在出国期间，均为北大聘请教授。第一次出国考察，曾于1920年聘请李四光任地质学教授，聘请任鸿隽任化学教授。第二次出国则聘请陈翰笙任历史学教授。陈翰笙在德国期间曾漫游欧洲各国，并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回国，1924年4月间在北大任教。此时蔡先生仍在国外，虽然在1926年2月3日由欧返沪，但始终没有来北大主持校务。所以，陈翰笙在北大任教三年，蔡先生在名义上是北大校长，但并未在北大共事。

③ 经李大钊同志介绍，从事共产国际的革命工作，成为

共产国际的党员。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1月大钊同志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8日在北大任历史系教授，仍兼图书馆主任，开讲“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在经济系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在法律系讲“社会主义”。同年9月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共产国际是通过李大钊同志与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系。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遣乌廷^斯等来北京会见大钊同志讨论我国的建党问题，随后大钊同志介绍乌廷斯等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建党前夕，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遣马林和李克诺斯基来到北京与李大钊同志商谈。最早时期，苏俄政府与孙中山的关系也是李大钊同志介绍的。1922日他介绍苏俄特使越飞与孙中山会见；1923年6月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由苏俄政府派来中国，先到北京与李大钊同志会见。长时期间，大钊同志与共产国际保持了密切关系。就在陈翰笙就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不久，大钊同志曾于1924年6月间到莫斯科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在陈翰笙在北大任教时，大钊同志既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同时还担负建立国民党的工作。1924年1月，大钊同志参加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年春间，大钊同志忙于建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以天津、直隶等地的党部。1924年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大钊同志担负总责。当时，建立国民党也是党的重要工作。因此，就不难理解，当1924年陈翰笙的好友高仁山绍同他一起去看大钊同志请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时，为什么大钊同志就和北大讲师于树德介绍他们两人参加国民党，而不是直接参加共产党。随后，高仁山就帮着大钊同志进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工作。过了一些时，大钊同志介绍陈翰笙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面。这不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而是革命工作的谈话。加拉罕动员他为共产国际做秘密情报工作，提供情报，为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撰写文章。陈翰笙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革命任务。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以及下面还要提到的出色的工作，使得这次会晤成为共产国际正式党员勾结的起点。

共产国际党的关系一直延续到193⁵年。到了193⁵年，共产国际因为国际党员的份在美国工作可能会有障碍，所以经过正式手续，经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

④ 接受马克思主义。 陈翰笙1924年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北京俄文专修馆讲师彼得·格林涅维奇。这位苏联教师是个饱学之士。他来中国教俄语，同时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他知识渊博，爱好研究，通晓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陈翰笙和他很谈得来，从他了解到苏联有关十月革命的情况。陈翰笙听从他的建议，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通晓英文、俄文、法文、日文，直接阅读马克思的原著，理解得比较透彻；而且世界历史知识根基扎实，基本功雄厚，所以读马克思的著作，兴趣十分浓厚，很能掌握其中的精神实质，学到的东西也容易消化。所以，两人相见行，谈之不绝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热烈到狂热的程度。有时候，谈到深夜，就睡在格林涅维奇房里地毯上过夜。他就在这个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终生奉为行动指南，而在词藻文句上钻研。

⑤ 为共产国际工作 陈翰笙交际广泛，中外名流学士，左中右，老中青，左右逢源，消息灵通，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更加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犀利的写作风格，再加上坚定的革命的观点立场。他所提供的秘密情报，除掉共产国际的档案可能留下一点蛛丝马迹而外，不但为外人所不知，就连他自己，也丝毫都不记得了。所幸，公开材料里还有证可考。北京的《现代评论》和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里还有他公开发表的当时的文章。他往往是一稿两用，中文稿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英文稿则交给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坎托洛维奇，由他送交共产国际。由于种种原因，要考证《国际通讯》上的文章，哪些是陈翰笙的手笔，还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单是《现代评论》上的文章，从1925年12月12日到1927年2月5日，这13个月期间，他一共发表了53篇文章。全部是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面的政论文章。视野极为宽广。事实证明他广泛地阅读国内的国际材料和苏联的本报材料。而且笔勤手快，几乎每个星期写一篇政论文章。迹象说明：一部分情报性的文章会在《国际通讯》上发表，也会有部分埋没在档案里，而《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部分材料

则来自《国际通讯》。《现代评论》是国民党右派的刊物。它是胡汉民出了五千元，给北大教授王世杰出面，为西山会议限收目的的一份周刊。王世杰在北大以英美派教授自居。陈翰笙留学欧美，周围的教授多在欧美相识，所以很自然地成为《现代评论》的编辑委员。而《国际通讯》则是第三国际的机关刊物，有英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各国发行，宣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本质，每周上呈周刊，但常常发行增刊，刊登共产国际会议的情况和瓦尔加的世界经济四季报告。陈翰笙居然在两种极端相反的刊物上兼而两职；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趣事，而且反映李大钊同志的英明领导和陈翰笙的辩证观点。大钊同志熟练地运用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的原则。陈翰笙则实事求是，只要于革命有利，就不怕别人议论他与国民党右派为伍的流言蜚语。大家都说，“人言可畏”，但陈翰笙却不畏人言，非但在北大时期如此，他一生都是如此。不贪图革命的虚名，只追求革命的实质，是他的特点。

⑤ 逢凶化吉 国民党右派李石曾原是随清廷驻法公使到巴黎住在公使馆里的一名闲员。因为学习法文，沾染了

法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李石曾经常与蔡元培来往。后来蔡先生聘请他到北大教生物学。李与北大保守教授结成一派，北大史学系的朱希祖就属于李石曾派。李于1919年1月离开北大，但李石曾派在北大仍有影响。朱希祖想排挤陈翰笙，找了几个^人假造了一封学生联名指责陈翰笙教课不称职的控告信，送交北大评议会。知道这事的教授以及陈翰笙的朋友纷纷献策，有的主张清查背景，弄个水落石出，有的介绍他去东南大学任教。陈翰笙同李大钊同志商量。李大钊同志指出这是国民党右派李石曾利用朱希祖向进步力量进攻的阴谋，不当清查背景，真是水落石出，事情就会闹僵，结果不利。他建议陈翰笙同周鲠生商量办法。当时周鲠生是法学院的主持人。周鲠生为人正派有正义感，很爽快地说：“到法学院来讲美国宪法史好了。”这样，陈翰笙继续在史学系讲西欧美史，同时在法学院讲美国宪法史。不但没有处于被动地位，反而扩大了影响。

⑥南下武汉·被召回。 1926年7月开始北伐，不到半年，192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执行政权。这一两年，

在军阀统治下,受压迫多年的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参加国民革命。当时,陈友仁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他和陈翰笙在北京有过来往。陈友仁想在北京创办一家英文日报,为此件事找过陈翰笙。陈友仁任外交部长后,急欲召募外交人才,立即打电报到北大,聘请三位教授(周鯨生、王世杰、陈翰笙)当外交部顾问。三人应聘同行,2月间到汉口。到汉口不久,陈翰笙接到李大钊托人带来一封信,要他接信后,立即离开武汉,回返北京。陈翰笙照办,立即托故请假离汉。2月底陈翰笙就回到北京。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在3月11日在南昌公开杀害共产党人,3月31日重庆发生大屠杀,5月17日反斗寅叛变,率军进攻汉口,6月5日武汉政府解除鲍罗廷顾问,7月15日武汉政权屠杀革命分子。当机立断,及早从武汉召回陈翰笙,无论是出自李大钊同志的预见,或是出自共产国际的决定,这个措施无疑是非常英明果断的。回顾历史,让一个共产国际党员去亲身经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变,并非失策,而立即召回,保留难得的人才用于更重要的工作岗位,确是上策。

⑦ 同蔡和森谈论农民运动一通夜

陈翰笙在1926年

初(或1925年底)同蔡和森在北京相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迹。蔡和森于1925年冬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路过北京,托人给陈翰笙在北京西郊巨一个村庄里会面。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两人谈了一个通夜。蔡和森熟悉彭湃的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以及广东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那一夜他谈了1923年以来彭湃组织海丰县10万农民的经过以及1924年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蔡和森主张陈翰笙以后要研究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到了80年代陈翰笙对他一直非常钦佩,认为他是我党非常出色的革命理论家。从那次会见以后,陈翰笙的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经济史的知识就应用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他在30年代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开辟了一个新局面:一是历史知识用于现实问题,创立了实用历史学的门径;二是奠定了农村经济研究的基础,为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开辟了门径。可以说他在30年代的研究工作是起源于他在北大的三年期间。特别是绝少笃路,一旦发现真理,就立即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认识。所以,他的实践是有理论基础的行动,他的理论是从实践过程中加深了认识的理论。因此他反对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的空谈,也反对盲目的、有航线的研究工作。

⑧ 离开北大，前往苏联。 陈翰笙在北大期间，一向与李大钊同志经常来往。1926年3月底李大钊同志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都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陈翰笙仍然到那里去^和李大钊同志联系。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被捕，陈翰笙的好友高仁山和北大女生张挹兰也同时被捕。陈翰笙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立即迁居隐蔽。经北京塔斯社主任明欣联系，陈翰笙到莫斯科后，就参加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工作。陈翰笙和夫人顾淑型化妆商人由天津去日本，在敦贺乘船到伯力，前往莫斯科。从此，结束了在北大这段时期的工作。